

# 從死亡區地誌學到疫情症候群： 我們要保護的，是誰的社會？

劉紀蕙\*

## 一、死亡區地誌學

自 2019 年底到 2020 年初之間，COVID-19 疫情開始席捲全球。時隔一年，全球疫情不但沒有減緩，反而一波又一波的變種病毒更為加劇傳染幅度與致命效果。<sup>1</sup>除了驚人的確診案例與死亡數字之外，這場疫情造成了跨國行動限制、失業人口與赤貧人口加劇、生產鏈斷裂、各級教育停頓、醫療體系崩毀等。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劫難，也還看不到盡頭。

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要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呢？

對我而言，反映在世衛組織官網統計圖儀表板上全球確診與死亡案例的紅色區塊分布圖，讓我們看到冠狀病毒的傳染路徑超越了所有的國界，而標示出了二十一世紀的死亡區地誌圖。

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 (Etienne Balibar) 曾經指出，二十世紀下半期出現了「生命區」(life zone) 與「死亡區」(death zone) 的不平等分布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2003)<sup>2</sup>。「死亡區」多集中於全球南方，尤其是在種族衝突或是宗教對立引發的內戰、飢荒及大量流離失所帶來的死亡。巴里巴爾提醒我們，表面上，這些相對集中的死亡區是外部因素所導致，但是，實際上卻是被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及複雜歷史過程所多重決定。

在全球化市場自由競爭與資本流動之下，二十一世紀離鄉背井的移動人口倍速成長，快速集中在各大城市的邊緣。<sup>3</sup>外地來的勞動人口，成為城市生產線所仰賴的勞動力。無論是製造業、建造業或是服務業，各種低端工作都被這些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

<sup>1</sup> 截至今年 (2021 年) 8 月，全球確診人數已經將近兩億人口，死亡人數也高達四百多萬人。

<sup>2</sup> Étienne Balibar(Author), James Swenson(Translator). (2003).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p>3</sup> 根據聯合國統計局 (UNSD) 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9 年為止，跨國移動人口已經累積到兩億七千兩百萬，比起 2000 年的一億七千三百萬的跨國移民人數，多出了一億多人口。比起 1960 年的七千萬人，則多出了兩億人口。

移動勞工所承擔。當地的人民對於這些帶著勞動力的外來人口卻視而不見，或是帶著歧視的心態，將這些異鄉人視為具有危險性質的潛在犯罪者。巴里巴爾指出，跨國資本引來的跨國移工，成為城市中的陌生人，也成為可疑而必須警戒防堵的敵人。這個內部的「敵對線」(enmity line)，構成了巴里巴爾所說的「全球內戰」(global civil war) (“Strangers as Enemies”)。

當前全球大流行疫情所暴露的，則是各地社會斷層的尖銳化。這些疫情熱點，如同視覺索引，指向了城市角落的低端人口地區。越靠近大都會，城市周邊的貧民區或是棚戶區的疫情越為嚴重。社會斷層並不僅只顯現於地圖上的紅色區塊，而更凸顯了背後不平等的基礎建設。這些貧民區環境擁擠髒亂，衛生與醫療條件匱乏，清潔的水源或是社交距離是無法想像的奢侈。過去兩年間，全球各地新聞刊登各地貧民區的擁擠照片，不斷發出警訊：還有更多被拋棄在後面的人們！

## 二、全球內戰與疫情症候群的歷史痕跡

透過疫情死亡區地誌圖，我們看到疫情期間被激化的，是各種斷層的加劇與難以彌合。這些斷層的視覺標記，是指向社會漏洞的索引：政府應對措施的顛覆，疫情醫療資訊的不透明，失業率的飆升，封城軍事控制的嚴峻，仇外情緒的高昂，公共醫療的失能。「敵對線」已經是反轉於社會內部處處設立的各種劃分線，是疫情症候群所呈現的另外一種形式的內戰。

如果我們看一下臺灣鄰近幾個東南亞國家對於新冠病毒疫情的反應模式，就會注意到，這些內部斷層激化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歷史痕跡，透露了某種特殊的殖民歷史痕跡，以及當前政府的內部殖民治理模式。

### (一) 馬來西亞的軍事化封城與煽動法

馬來西亞自從 2020 年開始幾度封城，採取的模式是軍事化的強制執行，並逮捕無證照的外籍移工。<sup>4</sup> 半島新聞於 2020 年 7 月製作的馬來西亞軍事化封城羈押外籍移工的紀錄片 *Locked Up in Malaysia's Lockdown*，讓我們看到這些外籍移工被軍方以腳鐐手銬逮捕，集中在被鐵絲網區隔的地區，如同囚犯。<sup>5</sup> 半島新

<sup>4</sup> 馬來西亞的軍事化行動管制令一開始，一兩個月間就有一萬五千人因為不遵守行動管制令而被逮捕入獄。

<sup>5</sup> 這些被集中拘留的外籍移工或是難民沒有工作，沒有食物，沒有醫療設備，只能夠等待民間團體自主運送物資食物。

聞的工作人員被馬來西亞政府以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偵查，搜索他們在吉隆坡的辦公室，帶走兩臺電腦及紀錄片工作人員，並且驅逐紀錄片中一位孟加拉移工受訪者，一輩子禁止入境馬來西亞。<sup>6</sup>

馬來西亞以軍事化的強制方式封城並逮捕外籍移工的景象，令人不得不起上個世紀英國殖民政府以防堵共產黨勢力擴張為名，強制五十多萬華人遷居到新村集中管理的歷史。但是，今日以「國家安全」為名集中拘留的「可疑他者」，不再是華人或是共產黨，而是提供勞動力的外籍移工。至於施行至今的煽動叛亂法，則是英國殖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期間頒布的 1948 年煽動叛亂法令。這個法令延續至今，已經成為對於執政者不滿的批評言論的治罪法源。馬來西亞政府治理模式反映出了馬來西亞社會殖民遺緒的反轉與內化，也製造出了另外一群被壓迫的人們。諷刺的是，普遍的馬來西亞民眾站在殖民者的位置，以各種歧視仇恨的言論，排擠自己所依賴的勞動人力。<sup>7</sup>

## （二）菲律賓的強人政治

疫情期間，菲律賓同樣採取全面軍事介入，進行邊界管理與封城。2020 年 3 月中旬開始執行戒嚴令，杜特蒂總統甚至下令軍警可開槍射殺違反防疫封城措施的民眾，並且逮捕不遵守封城禁令者。<sup>8</sup> 2021 年菲律賓疫情仍舊繼續攀升，杜特蒂甚至宣稱，拒絕接種疫苗者也將一律逮捕入獄。

菲律賓的戒嚴法早在十九世紀西班牙殖民時期就已經開始了。<sup>9</sup> 後殖民時期，馬可仕同樣以抵禦共產黨徒威脅為名，而從 1972 到 1981 施行戒嚴令。<sup>10</sup> 至於杜特蒂擔任總統之後，其所執行的戒嚴令也在這個傳統之內繼續複製。如此強制執行的戒嚴令與軍事管制，菲律賓的疫情仍舊嚴峻。<sup>11</sup>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人口稠密，情況最為嚴重，尤其是貧民窟，完全暴露了政府公共設施與基礎建設的無能及醫療體系的脆弱。當地居民在封城期間的擔憂是，我們會因飢餓而死嗎？

<sup>6</sup> 如此強制執行的幾波行動管制，截至 2021 年 8 月，卻仍舊有超過一百萬人確診，九千多人死亡。

<sup>7</sup> 馬來西亞的生產線與服務業大量仰賴外籍移工的勞動力，目前有五百萬移工，其中三百多萬人為無證照的移工。

<sup>8</sup> 到了 2020 年 9 月，已經有十萬人被逮捕入獄。

<sup>9</sup> 最初，西班牙殖民政府採取戒嚴令，是為了控制匪徒，後來則是對抗菲律賓十九世紀末的革命叛軍。爾後，不同的殖民政府，包括美國及日本，都採取過戒嚴令。

<sup>10</sup> 在其統治期間，馬可仕累積了鉅額的財富，而其侵犯人權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針對政治異議分子、學生激進分子、新聞記者及宗教工作者。根據統計，在其任內，總計有三萬五千件酷刑拷打的案子，三千多人非法執行死刑，七萬人監禁。

<sup>11</sup> 截至 2021 年 8 月為止，確診人數已經高達一百六十萬人，死亡人數超過兩萬八千人。

### (三) 印尼的否認政治及脆弱的基礎建設

2020 年 1 月間，印尼已經出現了疫情的案例。但是，直到該年 3 月中旬，印尼政府卻仍舊不承認印尼有多起感染案件，以免引起大眾驚慌，或是對經濟造成傷害。當時哈佛研究者指出印尼隱匿疫情，衛生部長 Terawan Agus Putranto 憤怒指責這些言論「侮辱」了印尼國人，並且強調印尼人民不必畏懼病毒，因為印尼人有強韌的免疫力及祈禱的力量。<sup>12</sup> 太遲來的警覺，政府隱匿疫情持續惡化的否認心態，關於疫情的資訊始終不透明，使得大眾無從得知相關的防護措施，而暴露於極端危險的處境。2021 年 7 月底單日確診數字高達五萬人，8 月初確診數字降到三萬四千人，現任衛生部長 Budi Gunadi Sadikin 於 8 月 2 日樂觀的表示：「我們已經度過了疫情顛峰，情況將會漸漸改善。」實際上，上述的數字並未透露真實的狀況。這種否認政治，如同一個結構性的存在，擴延於政府的各個層面，無力反省執政弱點，也無力糾正貪汙與貧富差距。<sup>13</sup>

### (四) 必須保衛社會——誰的社會？

從上述死亡地誌學所標示的脆弱環節與凸顯的各種治理模式，加上各地因疫情引發的不同社會反應，我們看到原本就存在卻不可見的社會斷層加劇。<sup>14</sup> 這種從不可見到可見的結構性現身，更讓我們意識到社會民間基礎建設的盲點。國家為了發展，而大肆發展建設工程，美其名為基礎建設，耗資天價。<sup>15</sup> 但是，民間基礎建設，例如：水電、交通、教育、新聞媒體、網路資訊、醫療照護系統，卻時常出現破口。政府不但不負擔起這些公共設施的責任，反而外包給私人企業經營，或是任由私營公司競爭壟斷。

疫情所凸顯的斷層線，顯然已經指向了社會中貧富懸殊之下日常生活資源與全面基礎建設的不平等。傅柯所討論的「必須保衛社會」心態讓我們理解到，不同社會可以建構出自己不同的內部敵人，以及抵禦外來危險的必要性。這些結構性與系統性的斷層，由政府的失能所構成，也成為民眾心態的理所當然。

<sup>12</sup> 2020 年 4 月間，印尼政府仍舊隱瞞死亡人數，宣稱只有七百人死亡。但是當時，僅僅雅加達一個城市就已經有超過一千人的死亡。

<sup>13</sup> 印尼蘇哈托的右翼人士為了推翻蘇卡諾政府，於 1965-66 年間以反共為名，進行長時期的大屠殺，受害者多為華人，死亡人數高達一百萬，甚至更多。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印尼政府始終不願意正式承認其罪行，因為當年的加害者直到今日仍舊占據著權力的位置。

<sup>14</sup> 臺灣雖然一直沒有陷入嚴重的疫情氾濫階段，但是，從最初開始的超前部署，便已經不斷透露出這種以國安為名尋找敵人的內戰心態。從陸生到小明到外勞的問題，如同社會症狀，因恐懼而引發社會內部最為敏感的衝突徵兆：在危急時刻，必須保衛社會，而基於對所有外來人士的恐懼與仇視，再次將宿敵標籤化、形象化。2021 年 6 月苗栗縣京元電子、超豐電子、京鼎精密科技等科技廠爆發移工群聚感染的事件，苗栗縣立即祭出「禁足令」，禁止移工外出，引發巨大爭議，也受到國際媒體矚目，更暴露了臺灣對於外籍移工的利用卻歧視的心態。

<sup>15</sup> 例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水壩、經濟特區港口、機場、運輸轉運站等。

這種面對眼前共同生活某一部分人全面被剝奪而無所感，是一種公民社會奇特的殘酷地景。

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正應該針對這種殘酷地景，進一步進行思考：在分隔線之下，為什麼公民會封閉了惻隱之心，而以國民或是公民的身分合理化自己的殘忍？為什麼公民也並非被保證是平等的？由於不同的條件與資源，民主社會的公民成為不同階層的公民。人們所應擁有的基本人權，也因為貧困而無法享有，遑論不具有公民身分的外籍移工與無國籍人士！基本人權對於二等公民、底層公民或是非公民、非國民而言，都成為無效的概念。<sup>16</sup>

### 三、殘酷地誌學與基礎建設的脆弱

全球移動人口劇增的二十一世紀，各地社會湧入了外地來的移動勞工，以及戰爭迫使遷移的難民，而改變了社會的結構。一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狀病毒擴散，立刻暴露了各地社會尚未調整的法律及心態，也凸顯了不同社會對於外籍移工難民的排斥甚至仇恨。從理論的面向而言，我們必須思考恐懼之下的人民劃分，以及轉移而鎖定的攻擊對象，如何牽連了歷史構成的因素？這些劃分線如何受到當下物質現實的刺激及法律政治經濟結構的鼓勵，而透過表面的症狀群浮現？

巴里巴爾曾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多麼相互衝突對立的力量，都會以看起來是同質性的程序，結合了各個代理者，包括各種政治經濟法律及意識形態力量，而構成了相互牽動的單一系統。當這些殘酷的暴力以綜合的方式，銜接了身分認同、共同體論述、公民政治、社會政策，就構成了一套綜合叢結，形成共同體持續重構的政治操作條件。

公民 (citizen) 原本意指 city-dweller，亦即聚居於此處公共空間的人群。但是，公民概念被國民所綁架；社會的斷層，不僅只是結構性的貧富差距，更是我他的區隔。為了防堵「病毒」，任何可疑人士都成為「病毒」的化身。政府也利用這種恐懼的政治，以安全之名為由，加強治理與控制，透過仇外排外論述而強化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國家為了要求發展與生產，而引入大量低薪的外來勞動者。<sup>17</sup> 這些勞動力隨時待命生產，沒有社會參與的空間，沒有平等醫療的支

<sup>16</sup> 基本人權所涉及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以及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是其他身分地位，都應享有不受奴役酷刑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權利、工作教育的權利等。

<sup>17</sup> 大城市有各種可見的基礎建設機制，例如建築工程、房地產、加工出產業、廢棄物處置、都市出租。這些城市經濟的物質基礎，需要各種建設與物流部署，例如橋樑、港口、高速公路、快速鐵路、虛擬金融、大數據。維繫這些基礎建設的勞動力，都是底層不可見的勞動者。

援，也無法擁有共同決定社區樣貌的權利。由於疫情刺激的恐懼與排外，這些外來勞動者卻成為可以隨時拋棄犧牲的廢棄物。

#### 四、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要如何回應因疫情而發生的改變？

我們看到了疫情無限延後的未來，而其對於全球國家的衝擊，則是無法計量。<sup>18</sup> 後疫情時期何時到來？這是身處今日尚無法預測的狀態。除了理論性分析之外，人文社會學科研究還要如何回應因疫情而發生的改變？我們的知識生產應該要如何回應當前的難題？

疫情擴散期間，我正在主持「全球人文學校」(Global Humanities Institute) 跨國計畫：「全球脈絡下的遷移、物流與不平等公民」。<sup>19</sup> 原本我們共同的目標在於針對全球脈絡下第三世界國家內部不同形式的社會衝突與不平等，尤其是大量遷徙之下的移動勞工、難民、無國籍人士、不平等公民、人口販賣等議題，結合跨領域學者的研究，共同探討不同社會形成嚴重排擠性的歧視、壓迫、暴力的心態、法律與機構。

2020 年初，全球疫情開始快速蔓延，讓我們警覺這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因此，我們開始邀請各國研究機構資深及年輕學者、人權團體與非政府組織，組織了一系列的線上論壇與研討會，思考二十一世紀疫情下移動人口與不平等公民的難題。<sup>20</sup> 在這些線上會議中，我們討論諸多議題（表一），我們也安排了線上的論壇劇場，由在吉隆坡暫居的阿富汗難民劇場 Parastoo Theater，演出疫情中的家庭暴力，並邀請觀眾一起討論劇情中的難題。

雖然這段時間我們無法出國開會，但是，透過線上會議，我們接觸了不同地區的研究員，也認識了各國長年致力於移工難民工作的人權團體與 NGO。我們不斷討論各地政府回應疫情的因應措施與其盲點，移工難民在疫情擴散期間幾乎完全被拋棄的困境，以及各地民間組織如何主動介入，提供各種救援協助

---

<sup>18</sup>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全球在 2021 年已經增加了一億五千萬到兩億的極端貧窮人口。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則估計，截至 2030 年，全球將會累積到十億的極端貧窮人口。

<sup>19</sup> 這項計畫連結十二個跨國學術機構的夥伴關係，三十六位國際資深學者，以及二十四位跨國年輕學者，從 2019 到 2021 持續三年，由全球人文中心聯盟 (Consortium for Humanities Centers and Institutes) 與 Mellon Foundation 獎助。

<sup>20</sup> 參與我們的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包括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菲律賓、韓國、香港、新加坡、澳洲及一些歐洲機構，加入這個全球人文學校的年輕學者則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南非及東南亞各國。從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7 月，我們前後規劃了二十四場公開的線上會議，其中有一個月一次的線上論壇，集中於兩天的工作坊，七場學者與學員的閉門工作坊，以及一週密集的暑假學校。

的措施。我們也不斷思考什麼是「公共」的社會？什麼是公共權力？什麼樣的社會是彼此照護的平等社會？如何使居住於同樣空間的人可以平等地被對待，例如底層人民、貧民窟的人、老人，無分之分？政府的公共責任是否面對的，並不只是「國人」，而應兼及此處居住的所有人民？民間的公共介入，是否可以更為積極？學校是否可以更為靠近社會？

表一：「全球脈絡下的遷移、物流與不平等公民」跨國計畫於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7 月舉辦二十四場公開線上會議之討論議題

項次	討論議題
1	邊界、物流與不平等生命
2	疫情中的難民難題以及藝術介入培力倡議
3	流行病、邊界政治與仇外心態
4	COVID-19 之下遭逢遣返的移工困境
5	來自南方的介入：全球疫情 COVID-19 之下遷移、物流與不平等公民的理論思考與介入實踐
6	移工介於法律與非法之間的難題
7	不平等照護與不平等權利
8	公民與非公民的爭議
9	後疫情之下的移工權利：醫療正義與媒體介入
10	海上漁工：海上的法律失靈
11	海上例外法域與失靈的法律？漁工勞權政策與海洋生命保育之反思
12	勞工移動的物流體系、基礎建設與機構性暴力
13	難民、人口販賣與跨國組織犯罪
14	創造空間：可歸屬的共有空間
15	移動人口與公民政治：身分認同與家庭變異

我們從阿富汗難民 Saleh Sepas 所主持的劇場 Parastoo Theater 學習到，難民不是等著被施捨被同情與幫助的一群人。他們有藝術創作的的能力，也可以對社會提供他們的貢獻。<sup>21</sup> 我們也從馬來西亞民間社會看到，雖然社交媒體充斥著仇外歧視的言論，馬來西亞社會還是存在著友善而相互協助扶持的人們，主動提供針對無證照移工與難民子女的教育協助，也在疫情期間集資派送各地所需要的食物與醫療器材。

這場疫情帶來的衝擊與改變是全球性的，也是持續性的。人文社會領域的學校教育及學術研究，必須要面對這些時代性的難題，進行跨領域及跨國的對話，相互學習，也必須要與民間社會組織合作，才能夠理解疫情所凸顯的社會斷層、體制脆弱、政府失能、醫療照護不平等與法律漏洞等弊端，以及其歷史因素。只有透過持續的分析與研究，才有可能生產有意義的知識，提供有效的教育，並尋求修正的方案。

<sup>21</sup> 這群難民在劇場合作的幾年過程中，從原本的無望、恐懼、思鄉、憂鬱症與無法行動，到逐漸培養出的表演、製作道具、撰寫劇本、舞臺設計的能力，以及他們的自信心與多元才能。